

嘉兴后学与朱彝尊诗注的再生产

陈 灿 彬

内容摘要:清代可考的朱彝尊诗注共有十六种,注者群体以嘉兴府士人(同里后学)为主。诗注的编纂和刊刻主要受社会风气、士人趣味、文本的地域性、注本的象征性等方面影响和推动。流传最广的江浩然、杨谦、孙银槎三家注本以及新发现的李富孙批语过录本在文献的层累中不断更新,其递进关系可以给未来的汇注指明方向,其开放性则昭示着再生生产过程的循环往复。“诗注再生产”是文学史上颇为普遍的现象,其机制、策略、过程虽然各有不同,但都能由此扩大文集影响力,成为作家经典化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朱彝尊 诗歌注释 嘉兴 诗注再生产

朱彝尊是清代著名的文人学者,其《曝书亭集》刊刻之后,就不断有人为其作注,其中尤以诗注的数量最多,从而成为清代文学史的一个突出现象。笔者称之为“诗注再生产”。再生产是政治经济学概念,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①再生产过程涉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书籍同样有出版、制作、发行、流传和接受的过程^②。因而,笔者把诗集注释及其出版流通、阅读

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21页。

②书籍史研究有两个重要的研究模式。法国史家罗伯特·达恩顿的交流循环模式(communication circuit)旨在对书籍生产的社会化进程进行分析,包括了作者、出版者、印刷者、贩运者、图书商和读者等参与者。英国分析目录学家托马斯·亚当斯和尼克拉斯·巴克尔的生命—目录学模式(bio-bibliographical),关注以文本为中心的交流循环,重视人与文本、社会与书籍的互动,简言之,文本生命由出版、制作、发行、接受和流传五个事件组成,被思想、政治、法律、宗教、商业等因素影响(戴维·芬克尔斯坦、阿里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0-34页。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和方法》,新星出版社,2017年,第52-56页)。

接受的过程称为“诗注再生产”。学界虽对竹垞诗注有过关注,但无论注本的整体研究还是个案研究都相对薄弱^①。本文先考述清代朱彝尊诗注的情况,然后从书籍生命的角度,回答是谁注释、注释的撰写和出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和推动、注本的流传和接受怎么样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文学史中的“诗注再生产”。

一、朱彝尊诗注考述及其注者籍贯分析

张宗友曾简单梳理过朱彝尊诗注的情况,然而只列出九种诗注,尚有不少缺漏需要补充。本节从亡佚和现存诗注两个角度重新整理,并对注者群体的籍贯特点进行分析、总结。

(一)亡佚诗注考

据笔者统计,可考的亡佚诗注暂时有八种。

1. 王浚、沈翼注本。许灿《梅里诗辑》:“(王浚)早游朱太史之门,称高足弟子。晚与蓝村子菜畦交最笃,曾同注《曝书亭诗》,惜未流传。”^②王浚,字上涛,号抱山,嘉兴人,著有《岫云轩集》《艺藿斋集》。“蓝村子菜畦”即沈翼。据朱休度《沈菜畦先生(讳翼)》一诗自注称:“先竹垞太史公志其墓,称为独行君子……先生实太史公高弟,尝注《曝书亭诗集》,惜未就。”^③可见,王浚和沈翼都是朱彝尊的高弟,两人实际是共同注释朱彝尊诗歌。据江燠《曝书亭诗录笺注凡例》载:“竹垞太史天资高迈,集中驱使典故,未易窥测。同邑前辈沈菜畦、周文石诸先生,并有注本。”^④周文石,生平不详,但其父周笱是朱彝尊的好友,因而与沈翼、王浚是一个辈分的^⑤。这三个人都是以小辈身份,与朱彝尊有直接的交往,可以归为朱彝尊的门生后辈圈。换言之,朱

①朱则杰:《朱彝尊〈风怀二百韵〉杨注、孙注及其他》,《朱彝尊研究(增订本)》,凤凰出版社,2020年,第207-211页。张宗友:《朱彝尊〈漫感〉诗三家注比义——兼论朱氏诗作之汇注与新释》,《嘉兴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5-12页。两人都是采取以小见大的视角,从某一具体诗歌观照朱彝尊诗歌注本,本文则从书籍生命的角度对诗注文獻进行整体研究。

②许灿:《梅里诗辑》卷二〇,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道光三十年(1850)嘉兴县斋本。

③朱休度:《壶山自吟稿》卷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40页。

④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卷首,乾隆惇裕堂刻本。

⑤潘耒:《过长水访朱竹垞,阅其藏书,同过天香庵看梅,寻缪天士、李斯年、周文石诸故旧,口占长句》:“古南禅伯今则无,米市诗翁不可作。”下半句小注曰:“文石之父青士。”(潘耒:《遂初堂集》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4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92页)青士即周笱的字。

彝尊诗歌的最早注释者,是以其门生后辈为中心的。

2. 朱方蔼注本。杭世骏序朱方蔼《小长芦渔唱》曾云:“(朱)春桥睥睨流俗,沉酣坟典,古今来僻书秘笈无不蒐讨,闲尝取竹垞翁《曝书亭集》一一笺释之,则其才之淹雅可知矣。”^①朱方蔼(1721-1786),字吉人,号春桥,晚号桐溪钓叟,嘉兴桐乡人。

3. 许灿《风怀诗注》一卷,傅增湘藏稿本^②。许灿,字衡紫,号晦堂,嘉兴人,诸生。该本今天已不知散于何处。

4. 柯汝鐸《曝书亭诗补注》^③。柯汝鐸,字清士,号北塘,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小传称其“补注《曝书亭诗集》,虽卧病犹不释手”^④,由此可见其注诗之情状。

5. 吴修《曝书亭诗集集注》。吴修(1765-1827),字子修,号思亭,嘉兴海盐人,监生,候选布政使经历。据载,《曝书亭诗集集注》是“纂辑诸家旧注,益以所闻见”,又“晚岁居嘉兴,日从事此书,哲昆榕园及李金澜遇孙助之编纂,未及刊而思亭卒”^⑤。可见,吴修的注本是汇辑诸家旧注且有自己的增订,晚年得到吴应和、李遇孙的协助,但注本没有刊布就去世。

6. 李富孙《暴书亭诗补注》。今存李氏文集尚有《暴书亭诗补注自序》,可见李富孙曾把补注汇辑成书,但此书今天已经难以见到。幸运的是,李富孙补注的内容仍然保留在国家图书馆所藏杨谦《曝书亭集诗注》中(详见下文),所以属于书亡而内容尚在,在这里姑且归为亡佚诗注的一种。李富孙(1764-1844),字既方,别字芑沚,号校经叟,浙江嘉兴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与伯兄超孙、从弟遇孙并称“小三李”,著有《校经顾文稿》《曝书亭集词注》等书。《暴书亭诗补注自序》称:“岁壬寅,先从祖敬堂先生自楚北解组归,招富孙与从弟遇孙读书‘愿学斋’,始习为韵语。先生授汉魏六朝洎唐宋

①朱方蔼:《小长芦渔唱》,《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27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439页。

②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五下,中华书局,1993年,第26页。

③许瑶光修,吴仰贤等纂:《[光绪]嘉兴府志》卷八一,《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1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652页。

④江峰青修,顾福仁纂:《[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二四,《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19册,第721页。

⑤李圭修,许传需纂:《[民国]海宁州志稿》卷一五,《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22册,第433页。

明本朝诸家诗。乡先辈《竹垞太史集》，尤爱吟玩。”^①李富孙与李遇孙早年都受到其从祖李集的诗学启蒙，而且后来都曾参与、主持朱彝尊文集的注释。

7. 钱大昕《曝书亭文集注》。《家述》称钱大昕所著书“未成者……《曝书亭文集注》若干卷”^②。可见《曝书亭文集注》并未成书。

8. 钱塘《曝书亭集释注》。《〔光绪〕嘉定县志》著录了钱大昕之侄钱塘所著《曝书亭集释注》^③。钱塘（1735—1790），字学渊，号溉亭，乾隆四十五年进士。两人都是嘉定（今上海）人。钱塘或许是推阐钱大昕未竟之意，然而其书已经亡佚，具体情况待考。

以上是现在可考的但已经亡佚的朱彝尊文集注释，除了钱大昕未成书的《曝书亭文集注》以及钱塘《曝书亭集释注》不能确定注释体裁外，其他六种都明确以诗歌为对象。就籍贯而言，这六种诗注的八位注者都是嘉兴府人氏^④。

（二）现存诗注

现存诗注八种，依次列述如下：

1. 朱正蒙《曝书亭集风怀诗注初稿》一卷（稿本）。朱正蒙（1727—1786），字育泉，乾隆三十五年举人，海盐人。是书已收入《清代稿本百种汇刊》第76册影印出版（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2. 俞国琛《风怀镜》四卷（嘉庆二十二年刻本）。俞国琛，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号杏林居士。南京图书馆藏是书四卷五册（索书号GJ/118928）。俞国琛不仅注释《风怀诗》，而且还对朱彝尊集中与《风怀诗》相关的诗词，如《静志居琴趣》等，进行摘录注释^⑤。

3. 冯登府《风怀诗补注》一卷（抄本）。冯登府（1783—1841），字云伯，一字柳东，号勺园、小携李亭长，嘉兴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冯登府在朱正蒙注《曝书亭集风怀诗注初稿》的稿本前面有题记曰：“《风怀诗》为大令所注，中多夹纸，杨注未及见也。大令少年馆曲阜孔府最久，与荭谷订交，后宰城固，卒于官，遗书多归其女夫许氏，此本余从娱老轩拾得，他日当视其子孙之

^①李富孙：《校经顾文稿》卷十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44册，第98页。

^②宋如林修，石韞玉纂：《〔道光〕苏州府志》卷一〇八，《江苏历代方志全书·苏州府部》第19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103页。

^③程其珏修，杨震福等纂：《〔光绪〕嘉定县志》卷二八，《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8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584页。

^④清代嘉兴府领县七：嘉兴、秀水、嘉善、海盐、石门、平湖、桐乡。

^⑤俞国琛：《风怀镜》，南京图书馆藏嘉庆二十二年刻本。

贤而与之。道光十有八年五月柳东记于四明窗。”^①朱正蒙是乾隆年间人,杨谦注释时并未参考朱注,所以杨注出现不少朱注没有的错误。冯登府《风怀诗补注序》批评杨谦注释“渗漏谬讹,不可缕数”,因此“暇日偶以《风怀》一首校之已”^②。根据史诤编《冯柳东先生年谱》,冯登府《风怀诗补注》作于道光六年(1826)^③,其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 A03005)。细绎冯注与朱注的内容,可以发现冯登府实际上大量借鉴了朱正蒙的注释,只不过主要用于纠正杨谦注释之误,所谓“补注”是针对杨注而言。需要注意的是,冯登府并没有在序中或正文提到朱正蒙的注释初稿。

以上三种是跟《风怀诗》有关的注本。

4. 钱珏《曝书亭诗榭》三卷,嘉庆元年钱廷烛抄本,今藏嘉兴市图书馆。钱珏,字玉圃,嘉善人。是书实具简谱与诗注为一,体例较为特殊。

5. 范洪铸《曝书亭诗集笺注》二十二卷,稿抄本。前十一卷藏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后十一卷藏在复旦大学图书馆^④。范洪铸,原名云鹏,字凌苍,号立堂,又号绿君,宝山罗店镇(今属上海)人。廪生。著有《百城楼诗集》《扶庐吟稿》^⑤。范洪铸是王鸣盛的门生,王鸣盛选《江左十子诗钞》《宝山十家诗》均将他列入其中。王鸣盛曾在乾隆四十年的《吴诗集览序》提到范洪铸的朱彝尊注本:“曩予亡友惠定宇注阮亭诗,久已脍炙人口;今予门人范生洪铸注竹垞诗成,亦称淹雅,正相与商榷开雕。”^⑥可知其时注本已经完稿,正在考虑刊刻,但是最终没有刊刻,而是以稿抄本的形式保留至今。

以上两种注本流传不广,现存注本以江浩然、杨谦、孙银槎三个注本影响最大。

6. 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十二卷。江浩然(1690-1750),字万原,号孟亭,嘉兴人,诸生。前期困顿场屋,后期奔走幕府。著有《北田集》《韵府群

①朱正蒙:《曝书亭集风怀诗注初稿》,《清代稿本百种汇刊》第76册,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1页。

②冯登府:《风怀诗补注》,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

③史诤编:《冯柳东先生年谱》,《儒藏·史部·儒林年谱》第44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69页。

④范洪铸:《朱竹垞先生曝书亭诗集》八册,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典藏号2040);六册,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索书号1275)。

⑤王豫编:《江苏诗征》卷一二四,《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第5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255页。梁蒲贵等修,朱延射等纂:《[光绪]宝山县志》卷十二,《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宝山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87页。

⑥王鸣盛:《嘉定王鸣盛全集》,中华书局,2010年,第447-448页。

玉补》《杜诗集说》《曝书亭诗录笺注》^①。江浩然与朱彝尊生活的年代虽有交叉,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两人有直接的交往。据江燠《北田集跋》言:“丙午(1706)后遂弃举业,端志诗古,日益工,与同里钮膺若、武进杨笠乘两先生,及朱芷间姑丈最契。每过从讨论不辍,倡和亦多。”^②雍正四年(1726)乡试失败后,江浩然彻底放弃科考举业,回到家乡后与钮世楷、朱琪等人谈艺论文、诗酒唱和。江燠提到的“朱芷间姑丈”,亦即江浩然的姐夫。事实上,朱芷间是江浩然与朱彝尊隐性关系中的重要一环。朱琪,字珣叔,一字芷间,朱彝尊晚年的弟子,以明经授衢州训导,循例引见,擢江南水利通判,摄江都令,著有《东溪诗集》。通过朱琪这个姻亲,江浩然与朱彝尊有间接的联系,注释活动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展开完善的。

7. 杨谦《曝书亭集诗注》二十二卷。杨谦,字子让,一字未孩。诸生。嘉兴人。著有《续经义考》《梅里志》《木山阁诗钞》《曝书亭诗注》。杨谦祖父杨汝霖在康熙四十八年曾与朱彝尊一道出钱作粥,救灾恤患,一时传为佳话^③。值得一提的是,杨谦是李集的妻弟。李集曾与李稻塍模仿《渔洋精华录》之意,掇取朱彝尊和李良年的古今体诗,汇编成《梅会诗选》^④。与李集有关系的杨谦、李富孙、李超孙都与朱彝尊的诗注有关联。

8. 孙银槎《曝书亭集笺注》二十三卷。孙银槎,字阶青,号竹尹,嘉善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

上述注者的籍贯特点除了嘉定(钱大昕、钱塘)、宝山(范洪铸)、山阴(俞国琛)之外,其余十二种均是嘉兴府人氏。范洪铸注本是难得一见的稿抄本,俞国琛注本是围绕单篇诗歌注释的刻本,而影响力最大的江、杨、孙三家注本,注者无一不是嘉兴人氏。这种注家的籍贯背景集中性值得引起注意。

二、朱彝尊诗注编纂和刊刻的影响因素

注者多是嘉兴府人氏,足以说明朱彝尊在嘉兴一地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同里后学对其诗歌有强烈的阅读需求和浓厚的注释兴趣。注释是为

^①江浩然的生平参见周守一《江孟亭先生墓志铭》和江燠《北田集跋》,俱载江浩然:《北田集》,国家图书馆藏乾隆惇裕堂刻本。

^②江浩然:《北田集》,乾隆惇裕堂刻本。

^③司能任修,屠本仁纂:《(嘉庆)嘉兴县志》卷二四,《故宫珍本丛刊》第96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132页。

^④李稻塍、李集编:《梅会诗选》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0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05页。

了辅助阅读,阅读又产生了注释,两者相辅相成。为了满足阅读需求,注本又会进入流通领域,被人传抄和刊刻出版。这种阅读需求、注释兴趣、刊刻动力的形成可以从诗注生成背景、诗歌文本的地域性、注释文献的象征性、科举时代的士人趣味四点进行论述。

首先,嘉兴人文环境与梅里的社会风气是诗注生成的重要背景。许瑶光说:“国初两浙人文,嘉兴最盛。陆清献隶平湖,张杨园隶桐乡,皆以理学名儒著,至经籍考据词章之学,则推朱竹垞太史,籍隶秀水。”^①史称杨谦:“恂恂儒行,好读陆陇其、张履祥之书,又于朱彝尊为同里后辈,相去未甚远,知其事最悉,为撰年谱,注《曝书亭诗》。”^②清初嘉兴一地钟灵毓秀,三位先贤对于同里后学有不可小觑的模范作用。就文学而言,不得不提的是朱彝尊的影响。郑方坤揭示江浩然和朱彝尊的承继关系时说:

同里朱竹垞先生以巨儒硕学为风雅宗,与新城王尚书狎主齐盟,若前代之李杜、坡谷然者。先生既退居长水,则以诗学唱导后进,凡经指授,及私淑其门者率振厉成一家言。屈指门下士,著录不下千人,而耳濡目染,守先生之微言而勿失者,实惟苔岑梓里,渐被独深。万原固于三十年后闻风而兴焉者也。^③

朱彝尊在康熙三十一年罢官之后就携眷离京,退居家乡,在家乡倡导诗学、提携后进。亲炙朱彝尊的学生人数众多,而私淑其门,耳濡目染,恪守朱彝尊教诲的同里后生更是举不胜举。江浩然就是属于私淑朱氏的序列。朱彝尊曾言古代嘉兴的读书风气:“乡之士大夫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耻为胥吏,罕习武事。”^④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这种风气有所中断,朱彝尊罢官后的乡居活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振兴嘉兴的人文传统。这也使得梅里一区的文化氛围浓厚,人才接踵而起。从许灿《梅里诗辑》,李稻塍、李集《梅会诗选》等书收录的文人就可可见梅里诗学之盛,非同一般。王东溟就慨叹雍乾年间“里中言诗者守太史一家之言”^⑤而不知变化,赵怀玉为杨谦所作的《借书图记》对当地的读书风气就有切身的体会,其云:“越中故多藏书家,喜为根柢之学。余尝游梅里,见其家执一编,村童巷竖无不乐谈风雅,非父兄之教,与夫性能笃好之者,孰克致此哉!”^⑥古时向学的传统再次焕发生

①杨谦纂,李富孙补辑,余楸续补:《梅里志》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716册,第725页。

②司能任修,屠本仁纂:《〔嘉庆〕嘉兴县志》卷二五,第159页。

③郑方坤:《本朝名家诗钞小传》卷四,中华书局,1991年,第367页。

④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三八,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440-441页。

⑤王焯:《白华堂集》卷首,《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314册,第468页。

⑥赵怀玉:《亦有生斋集》文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470册,第71页。

机,同里的注者正是在以竹垞为宗的环境下孕育出来的。杨谦从小就被其父命令学习朱彝尊《鸳鸯湖棹歌》,其后才走上了注释之路,就是“父兄之教”的具体化表现。吴仰贤《小匏庵诗话》云:

梅里一区,经竹垞翁提唱宗风,后进之士闻风兴起,在乾嘉时,如杨子让明经谦,文璞茂才蟠,父子济美,著述哀然。李奉樞孝廉超孙,芑沚明经富孙,庆伯明经遇孙,为秋锦先生五世孙,群彦翩翩,一时有“小三李”之目。复得丁小鹤明经子复,张尧民孝廉昌衢,羽翼接武,踔厉文坛,亦文人鼎盛时也。稍后冯柳东太史登府以承明著作之才,屈就琴堂,宰将乐县。^①

朱彝尊乡居的一系列活动让他深受同里后学的爱戴。仅就上述提到的人物,与诗注有关的就有杨谦、李富孙、李遇孙、冯登府等人。李富孙还因朱彝尊之诗在当时已有江、杨、孙三家注本,而词体尚未有人涉足,所以选择注词,著成《曝书亭词集注》。对他来说,诗文虽是雕虫小技,注释更是琐碎不足言,但是“惟与先生同里居,遗韵流风,犹得濡染于百馀年间,心窃慕之,则虽有以琐琐相消者,其亦奚辞”^②,由于受到同里先贤遗韵流风的感召,注释便成了在所不辞的事情。因此,注者多出自同里后学,与嘉兴人文风气和朱彝尊的介入有很大的关系。

其次,朱彝尊诗歌内容与嘉兴一地的联结性。朱彝尊诗歌中有大量关于本地人物、风物的书写。注者与作者同处一个社会空间,无疑更具理解的优势。杨谦凡例称其“自幼入家塾,先子即命谦读朱先生《鸳鸯湖棹歌》,悉经口讲指画,未几先子下世,而谦于先生诗,遂不敢弃置,爰为注释”。杨谦用描写本地风光的《鸳鸯湖棹歌》作为儿子的启蒙文本,通过口头讲授以及实地指证增加印象,提高理解,由此加深地域认同感。杨谦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从而走上注释之路。凡例又称:“余家与先生同里,凡遇用里中故实,郡志邑乘所不载,无可援引者,以余所纂《梅里志》附注焉。”^③杨谦编纂《梅里志》与注释朱彝尊两项工作是先后开启,交叉进行的。一方面,朱彝尊诗文与嘉兴的联结性意味着诗文本就是一份珍贵的方志编纂参考文献。另一方面,只有熟稔当地的人物和风物,才能更好地理解朱彝尊的诗文。杨注本的一大特色就是发挥了同里优势。事实上,以同里后学为主体的注本

①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卷七,《清诗话三编》第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570页。

②李富孙:《曝书亭集词注》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724册,第483页。

③杨谦:《曝书亭集诗注》凡例,乾隆杨氏木山阁刻本。

都有这个特点。徐嘉曾说:“注者皆乡里之后生……故宜樛李父老,近饷丛谭。”^①这个特点早在江浩然注本就有体现,如卷十一《班鱼三十韵》,江注曰:

《嘉兴县志》:班鱼状似河豚。按:吾乡所食之班鱼,长止二三寸,似河豚而无毒,非《本草》所载大而毒者也。

县志虽有班鱼的描述,但甚为简略。江浩然提供了更为精确的信息,这是因为注者与诗人同处一地,对于家乡风物要比外人乃至文献记载有更为亲切的认识。杨谦编纂乡志,对里中故实更为熟悉。诗注中大量引用自撰的《梅里志》,主要是诗中所写乡里的地点和人物,甚至还在诗注叙及家族的往事。如卷二一《题盛叟生圻》提到外祖父沈时,如卷二二《即事二首》提到祖父杨汝霏。朱彝尊诗歌的早期注者多是门生后辈,本质上就是利用时空上与作者接近的天然优势,这对于解读地域联结性较强的诗歌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因此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地缘上的注释传统。

再次,“南朱北王”的称誉推动朱彝尊注本的编纂和刊刻。朱彝尊与王士禛是清初并称的骚坛宗匠,王士禛《渔洋精华录》早已有两家注本刊行(乾隆二年的金荣《渔洋精华录笺注》、乾隆二十二年的惠栋《渔洋精华录训纂》),而朱彝尊尚未有相应的注本问世。在这方面,朱彝尊明显落后于王士禛。时人想要寻找平衡,必然发愿为朱作注。朱方蔼曾参与修订惠栋的渔洋诗注^②,其为朱彝尊诗歌作注,或许是因“王有朱无”的触动。杨谦编纂《梅里志》是因渔洋诗歌的两位注者对于“梅里”的错误解释,因此有必要为家乡修志,扩大知名度^③。编纂过程中又着手注释朱彝尊诗歌,某种程度上也是面对王士禛已有诗注的事实,进而受到家乡自豪感的驱使开始注释。孙银槎则直接阐明这种注释动机:

时从先业师钱补巢先生游学为诗,师为《论诗绝句》,自三百篇逮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一一指示,于本朝则有“新城秀水未能攀,当代诗人第一班”之句,然《精华录》有注,而《曝书亭集》无之,于诵习之下,时有所得,辄录片纸,置集中,未成帙也。^④

孙银槎的业师钱梦龄,其字祚贤,号五峰,嘉善魏塘人。诸生。著有《补巢书屋诗集》。钱梦龄《论诗绝句》把王士禛和朱彝尊并举只是时人的一个定论,但年轻的孙银槎的诗史认知却是从此得到形塑。孙银槎在乾隆二十四年开

①顾炎武著,王遽常辑注:《顾亭林诗集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32页。

②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26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508页。

③杨谦纂,李富孙补辑,余楫续补:《梅里志》卷首,第661页。

④孙银槎:《曝书亭集笺注》卷首,嘉庆三有堂刻本。

始注释,其时惠栋的《训纂》刚刚刊行,这或许并不是时间上的巧合。孙银槎显然认为只有注释朱彝尊集子,才能符合王朱并称“当代诗人第一班”的事实。

江浩然注释时虽没有渔洋诗注的刺激,但其子江壘选择的刊刻时机则隐含这个历史信息。乾隆二十二年,江浩然卒后七年,江壘开始刊刻其《北田集》。乾隆二十四年准备刊刻《曝书亭诗录笺注》,江壘邀请沈廷芳作序,沈序即是作于是年四月上旬。乾隆二十七年仲春,江壘写就《诗录笺注》凡例六则,此时该书正在校对和陆续刊刻之中。乾隆二十九年冬,时任广东学政的翁方纲按试高州(今广东茂名),同在高州的江壘登门请谒翁方纲为注本作序,翁氏欣然答应,并在乾隆三十年草就序言。所以附上这篇序言面世的注本不会早于乾隆三十年。值得注意的是,江浩然另一部著作《杜诗集说》在乾隆四十三年才刻出来。《诗录笺注》之所以能在乾隆二十四年就纳入出版日程,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有密切关系的。如上文所言,《渔洋精华录》已有两家注本行世,而且惠注本在乾隆二十二年刊行之后,已经引起了一定的社会效应。作为与王士禛齐名并价的本朝诗人,朱彝尊无疑也需要一本诗注。沈廷芳作序称:“本朝风雅之林,远轶前代,南朱北王,王郁为首选。《渔洋精华录》已有注本行世,竹垞先生诗集无闻,承学之士,手一编而不解其义,迂迂病之。”^①王朝颺《曝书亭集笺注序》:“盖先生之诗与渔洋称两大,虽赵秋谷不能有异议……王之《精华录》……其全为注释者,中吴金林始《笺注》,东吴惠定宇《训纂》,其时竹垞诗未有注之者也。”^②可见,朱彝尊尚无注本是当时的一大卖点。江注本在这个时机准备刊刻,孙银槎在这个节点开始注释,都是为了弥补朱彝尊没有注本的遗憾。

最后,科举改革与朱彝尊诗歌风格博雅的吸引力。乾隆二十二年朝廷下令科举试诗,此后逐步下沉到各级考试中,也就是说,广大士子需要掌握写诗的技法,储备写诗的材料。纪昀曾批评时人阅读注本的意图说:“大抵笺注故实,供初学者之剽窃。初学乐于剽窃,亦遂纷然争购之。”^③可见当时读书人的基本阅读需求。朱彝尊论诗“必以取材博者为尚”^④,创作强调博雅,以学问为诗。时人以“贪多”批评,但这可作为缺点,也可视为优点。杨士凝说:“翻阅《曝书》之多,《带经》之好,非耳热其横绝当代之盛名,实太息时贤之无此根柢也。”^⑤江浩然《自跋旧诗》就不把“多”视为需要避免的缺

①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卷首,乾隆惇裕堂刻本。

②孙银槎:《曝书亭集笺注》卷首,嘉庆三有堂刻本。

③纪昀:《唐人试律说自序》,《纪晓岚文集》第三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1页。

④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三九,第448页。

⑤杨士凝:《芙航诗禊》卷二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68册,第363页。

点,反而用来评价自己的诗歌:“不高不庳,参差俶诡。北筑新城,南疏秀水。岂曰功成,略言形似。爱好贪多,聊复尔尔。”^①可见这是一种理想的美学追求。江浩然以欣赏的态度对待,曾称赞“竹垞诗无字无来历”说:

韩昌黎诗:“金鸦既腾翥,六合俄清新。”注:“金鸦,日也。”东坡诗“城头初日始翻鸦”,出自韩句。施宿《苏诗注》不知引此,后人亦鲜能见及者。苏固善于用事。竹垞诗云“有若暝坐翻金鸦”,则兼用韩、苏,不啻贡金铸鼎矣。余喜竹垞诗无字无来历,集中如此类,要未易悉数也。^②江浩然既指出施宿注释的疏忽,而且认为竹垞诗句“贡金铸鼎”,兼用韩愈、苏轼两人的诗句,即诗义上源自韩愈,字面上则袭用苏轼。这类无字无来历的诗歌,在竹垞集中是数不胜数的。这也是江浩然从事注释破译的乐趣所在。后来的注家大多提到竹垞诗歌这种特点,如杨谦:“先生用事博赡,经史传注外,如诸子百家以及稗官小说、山经地志,罔不采用。”^③冯登府:“竹垞太史天分既高,学力倍至,《曝书亭集》使故实极富,真无一字无来历者。”^④无一字无来历的特点是吸引众多注者争相注释的重要原因,而通观现存注本,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对典故的解释。这与朱彝尊诗歌的特点是相呼应的。另外,结合上述所言的科举改革,可知士子热衷典故是有现实的考虑。一方面,诗歌博雅的特点可以让注者通过注释进行知识训练,如孙银槎在乾隆二十四年二十岁时开始注释^⑤,就时机和年龄而言,与当时科举改革之后的社会需求以及朱彝尊诗歌特点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注本一旦出现,也能满足初学者的阅读期待,进而激发更多读者进入注者的行列。

三、从文献的编纂看注本的流传和接受

诗注文献本质上是读者阅读诗歌的产物,当其进入流通领域时,同样也要面临众多读者的检验。这些读者/注者的共同目的是,通过注释的话语形式,理解和阐释诗歌。注者阅读和利用前人注本,不断进行融化更新,推动注本的更迭和完善。这是注本流传和接受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再生产”

①江浩然:《北田集·北田诗臆》,乾隆惇裕堂刻本。

②江浩然:《北田集·溺笑闲谈》,乾隆惇裕堂刻本。

③杨谦:《曝书亭集诗注》卷首,乾隆杨氏木山阁刻本。

④冯登府:《风怀诗补注》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

⑤孙氏生卒年不详,但根据其履历档案,可知生于乾隆五年。其《曝书亭集笺注缘起》曰“笺注之役,始于弱冠”,可知工作开始于乾隆二十四年。需要注意的是,官年与实际年龄可能会有一些误差(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20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10页)。

经常联系和不断更新的应有之义。本节以江、杨、孙三个注本和李富孙批语过录本为线索,从文献编纂的角度,呈现注本之间的递进关系,从而直观体会诗注的再生产。

先看江、杨注本。江浩然在雍正年间就完成《曝书亭诗录笺注》,其《寄钮膺若》其四有自注称:“余注《竹垞诗集》,钮借观已六年矣。”^①这组诗作于雍正十三年(1735),可证钮世楷借书时间在雍正七年。此时江浩然的注本大致成形,钮世楷借观后又作了一些补注,后来刻本保留了将近三十条。《曝书亭诗录笺注》是选注本,共选诗歌501首,仅仅是《曝书亭集》所收诗歌的百分之三十。周中孚因而称其“仅选三分之一,盖欲以况《渔洋精华录》也”^②。江浩然对朱彝尊的态度是比较理性的,既称赞其诗歌“无字无来历”,也曾罗列其“用事之误”^③。这些用典有误的诗歌并没有选入注本,可见江浩然对朱彝尊的诗歌是有去取的态度。另外,选注的形式自然在篇幅上给后来者留下了拓展的空间。作为朱彝尊诗歌第一个刊刻的注本,后来的注者想要突破,只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增补修订。

杨注本在凡例就明言:“是集近有江氏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一书,仅选三分之一,余间有采取者,因其书已刊布,不复别为标识。”可见杨谦正文采用江注,没有标识其名,因而读者很容易忽略江注的存在。不过,杨谦增注了江浩然未选的朱彝尊诗歌,使其书成为第一部刊刻的朱诗全注本。杨注本的初印时间在乾隆四十三年之前,现存的版本,就笔者有限的目验,均为后印本^④。注本刊成之后,杨谦就与弟子说:“昔放翁谓作诗难,注诗尤难。吾注朱检讨诗,正多遗缺,汝曹有志,宜搜补之。”^⑤可见,杨谦并没有以注本完善自居,反倒鼓励弟子们搜补遗阙。这是杨谦“虚己”的一个表现,也把诗注的编纂置于开放性的状态。

再看孙银槎注本。据《曝书亭集笺注缘起》所载,孙银槎从乾隆二十四

①江浩然:《北田集·北田诗臆》,乾隆惇裕堂刻本。

②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七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153页。

③江浩然:《北田集·溺笑闲谈》,乾隆惇裕堂刻本。

④杨谦《曝书亭集诗注》卷五《雁门关》有多处挖版,挖掉的都是“沈德潜”三字。乾隆四十三年,沈德潜因徐述夔《一柱楼诗》案被清廷革去所有官衔谥典,乡贤祠牌位被撤出,所赐祭葬碑文也被仆毁(上海书店编:《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652页)。一时之间,沈德潜成为社会上的禁忌。杨注本挖版应在此之后,可证其初刻时间在乾隆四十三年之前。笔者目验的版本有国家图书馆藏本、天津图书馆藏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均是乾隆晚期杨氏木山阁刻本。

⑤《[光绪]嘉兴府志》卷五一,《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13册,第439页。

年开始注释,不过比较随意,并未成书。乾隆三十二年,孙银槎主讲于虞山书院,才有机会整理注释,汇录成帙。杨谦注本刊刻之后,孙银槎才意识到江杨两家注本的存在。珠玉在前,孙氏一度认为如果继续注释,恐怕会有叠床架屋的嫌疑,恰逢此时(乾隆四十二年)正在绩溪县任官,忙于公务,所以暂时先把注释放在一边。不过,孙银槎仔细阅读和研究两个注本后,发现“其踳驳颇多”,因此准备董理旧稿,“增删改易,采二注之合者”^①。孙注本每卷卷首都题“嘉善孙银槎竹尹辑注”,“辑注”非常能代表其生产状态,也就是在江、杨两家注本的基础上增删改易。比对三家注本可以发现,孙银槎大量采用了江杨两家注释,充分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孙银槎批评前面两家注本过于踳驳,自信可以跨越前良,后来居上,这是无可厚非的。其年轻时曾与吴璜纵谈朱彝尊诗歌,吴璜“叹其隶事之精,如‘佳书报谢安’句,人罕知其用孙过庭《书谱》”,孙银槎也“间有陈说,欣然许可”(《曝书亭集笺注缘起》)。此句出自朱彝尊《山阴苦雨酬谢处士》,杨注本卷四引《晋书·谢安传》前方驿书驰报谢玄击破苻坚一事进行解释,但实际则如吴璜所说出自孙过庭《书谱》。钱锺书后来也指出杨注的错误:“下句用王子敬尝作佳书,(谢)安题墨还之。见《书谱》。”^②可见,即使杨注本是“朱诗最权威的注本”^③,但其中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孙注本对其有所超越,也应坦然承认。正如杨谦所说,其注释仍需要有志之士继续订正。

朱休度曾勉励杨谦的儿子、李集的学生杨蟠继续完善诗注,《奉题亡友杨未孩翁遗照》曰:“不闻司谏笺坡集,要待郎君补缀勤。”小注称:

翁所撰《曝书亭诗集注》,用心最久,搜采可谓勤矣。顾宋施氏注苏诗,自元之及子宿,再世方成,而放翁序犹举坡公“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及“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等句,细疏其曲折,以证注诗之难如是。今家太史诗见近世已有三家注,然诗中隶古之隐,猝难周知,而按切时事,类如放翁所举坡诗之例,必待深考者不少,倘欲益致精详,非旋吉之细心博识,不能善述此事。老夫虽没齿,犹将悬目视之。^④

此诗写于嘉庆十四年。朱休度首先肯定杨谦注释所下的功夫,但也认为近世三部注本(江浩然、杨谦、孙银槎)的“隶古之隐”和“按切时事”,仍有相当

①孙银槎:《曝书亭集笺注》卷首,嘉庆三有堂刻本。其生平参见汪能肃:《嘉庆道光魏塘人物记》卷二,国家图书馆藏道光刻本。

②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14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62页。

③刘玉才:《朱彝尊诗文的结集与刊布》,《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95年,第298页。

④朱休度:《侯宁居偶咏》卷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78册,第610页。

大的提升空间,因而鼓励杨蟠完善诗注,使其后出转精,如同宋代施氏父子注释苏诗一样成为美谈。

杨蟠后来没有修订其父的注本,但是却有其他人继续这项工作。上文提到李富孙《曝书亭诗补注》已经亡佚,但是笔者新近发现国家图书馆藏乾隆年间杨氏木山阁本《曝书亭集诗注》保留了李富孙的批注内容^①。此本是常见的后印本,半叶11行23字,小字双行30字,白口,左右双边,有批注,国图著录为“失名批注”。书中没有留下题跋等副文本,所以难以快速获取批校者信息。然而寻绎批注内容,可知此本批语出自李富孙。

首先,眉批有“富孙”“富”。卷七《西山书所见》:“莫笑游人今岁早,马头山店已烧春。”眉批有“富孙按”。卷十四《题沈上舍洞庭移居图六首》其五:“生怕东山鹅鸭闹,轻帆径度莫釐峰。”眉批有“富按”。可知应是指李富孙。

其次,批注内容所体现的注释观念与李富孙《曝书亭集词注》相同。卷八《鸳鸯湖棹歌》眉批曰:“集中原注应标明自注二字,方有眉目。《棹歌》百首,自注尤多,有原注撮其大要,杨注复为引伸者,若不标清,看去反似复出。”自注应当标明和保存是批注内容的一大重点,这与李富孙《曝书亭集词注凡例》所言“原集有先生自注并列于前,并标明以别之,其或前有应注,即云见某卷”^②是相符合的。又如卷四《南镇春游词》眉批曰:“原集系先生晚年手定之本,有以字句未安,复更易者,有以此诗改入他诗,有删并数诗,止存一二首者,有两诗复出而或删或存者……是编附载集外诸诗,殊非先生手定本意,应删去。类此病者甚多,均宜删。”批语经常强调尊重朱彝尊手定之本,审慎对待诗文的辑佚。这种态度与李富孙《曝书亭集词注凡例》所言“原集系先生晚年手定之本,其词尚有见于《六家词》《瑶华集》等书,或删去不存,当非惬意之作。今不敢附入,并有与《六家词》字名互异,亦为后来窜改,兹不复引”^③也是相同的。由此不难判定,批注内容出自李富孙之手。

需要注意的是,国图藏本并非李富孙所评原本。李富孙批阅的是初印本,而国图藏本已是后印本。这从批语和正文的部分不相称可以看出。如卷十七《御茶园歌》眉批曰:“东坡粟粒句见《荔支叹》篇,非茶诗也。”杨谦注已改引《荔支叹》。此种例子甚多,足以说明李富孙的批语是针对初印本,而杨谦后印本已经修订了某些错误,因此,上述批语显得无的放矢。卷六《风

①杨谦注,李富孙批:《曝书亭集诗注》,国家图书馆藏乾隆年间杨氏木山阁本,索书号04707。

②李富孙:《曝书亭集词注》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724册,第484页。

③李富孙:《曝书亭集词注》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724册,第484页。

怀二百韵》眉批曰：“是诗只宜笺释故实，其时地略而不论可也。篇中援证处俱删。”今天所见后印本的“篇中援证处”也多被抹掉，可是过录者却常将这些初印本的注释补抄上去，这与李富孙所持的观念相矛盾。由此可见，此书批语是别人过录而来的。国图藏本的批语、夹条对于初印本的内容有许多提示，今天虽然难以看到杨注本的初印本，但可从国图的过录本中获得许多初印本的信息，比如改动违碍字眼，保持了《曝书亭集》的原貌；补回挖版的地方，还原了杨谦注释的原貌。因此，其版本价值很高。

李富孙《曝书亭诗补注自序》：“里中杨丈未孩为诗注，富孙涉猎它书，偶有所得，辄补录于其上……近嘉善孙氏复刊注本，富孙因参合两家，其杨氏所阙而孙氏已补者不复录。”^①李富孙后来参考孙注本，删掉与孙氏相同的条目，重录为《曝书亭诗补注》一书。今天所见批语还没经过这层处理，如上述所引“佳书报谢安”一句出典，孙注本已有正确注释，但卷四眉批仍云：“此引谢安破苻坚事，无涉。”眉批是正确的，但没有指明出自孙过庭《书谱》。按照自序所言，这种条目在《补注》中是应该删除的。可见，此本批语应是从批校原本过录而来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从批语内容看到李富孙的注释观念，也能由此把握杨谦注释的得失。未来编纂新注本不能忽略了国图过录本。

李富孙《补注》成书后，仍然强调：“第太史博极群书，非浅眼所能尽见，仍惧滋疏陋之消。”（《自序》）可见其同样不以完美自居，期待别人的补正。李超孙曾经协助吴修编纂《曝书亭诗集集注》，可能就利用了其兄李富孙的补注。此书已经亡佚，但也可见竹垞诗歌注释的工作没有中断。周中孚曾就朱彝尊注本的读法说道：“（江浩然）注已为杨未孩注本所取材，读竹垞诗者，固当以杨注本暨孙竹尹注本为主。”因而“欲合三家注为一书，如冯星实《苏诗合注》之例”^②。现代学者朱则杰、张宗友也呼吁对朱彝尊诗词进行汇注和新释，编成《曝书亭诗词集注》。这种设想的展开其实也是意味着文集进入注释“再生产”的过程。我们期待朱彝尊诗词集的新注本产生，但也可以预测，即使新注本出来，仍旧会有新的呼唤，如辨正增订之类的文献衍生，因为给经典作家作注本身就是不断更新的再生产过程。

四、余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对于引言抛出的问题已有清晰的答案。清代可考的朱彝尊诗注共有十六种，注者群体以嘉兴府士人（同里后学）为主。诗

^①李富孙：《校经顾文稿》卷一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44册，第98页。

^②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七〇，第1153-1154页。

注的编纂和刊刻主要受社会风气、士人趣味、文本的地域性、注本的象征性等方面影响和推动。流传最广的江浩然、杨谦、孙银槎三家注本以及新发现的李富孙批语过录本在文献的积累中不断更新,其递进关系可以给未来的汇注指明方向,其开放性则昭示着再生产过程的循环往复。

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就会发现“诗注再生产”是文学史上颇为普遍的现象。注者一方面作为读者阅读作品,另一方面扮演作者阐释作品,因而具有双重的角色。在注者为作品撰写注释时,实际上已经开始新一轮的文本生产。当注本刊刻后进入流通领域,又为新的读者接受,而当读者不满其注释时,又会以作者的姿态进行修订更新。可以看到,每个注者都试图还原作者的本意,但又无法做到百分之百还原,因而不断催生新的注者。这个过程从理论上是可以穷尽的,但事实上又是没有止境,所谓“考证之学,不可穷尽,难执一家以废其余”^①。注本一般只能是未完成的动态文献(living documents),需要不断增补和修订。所以“诗注再生产”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

文学史上《诗经》《楚辞》的注本之多就无需赘言,就别集而言,宋代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盛况,苏轼诗歌在宋代也有十七种注本,可谓蔚为大观^②。清代注释学大盛,产生了大量前代诗人别集注本,就笔者关注的“清人注清诗”而言,吴伟业诗歌就有程穆衡《梅村诗笺》、靳荣藩《吴诗集览》、吴翌凤《梅村诗集笺注》;王士禛诗歌有徐夔注、金荣《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黄任诗歌有叶梦苓《香草斋诗注》、陈应魁《香草斋诗注》、王元麟《秋江集注》、芸窗主人《香草笺》、寄闻轩《香草诗偶笺》等注本;清人试律诗更是在制度的驱动下遍地开花,吴锡麒的《有正味斋试帖》有三种注本行世,路德《怪华馆试帖》也有五种注本。这些注者与作者可能有亲缘、学缘、地缘的关系,注释时或是不约而同,或是前后相继,但都是为了更好理解作者及其作品。“诗注再生产”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其机制、策略、过程虽然各有不同,但都能有效扩大文集影响力,成为作家经典化的重要一环。展示诗注再生产过程类似于版本学上的源流梳理,本身就是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关键,至于过程背后的结构性特点则需要我们未来在丰富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探索总结。

【作者简介】陈灿彬,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清代文学文献学。

^①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7页。

^②陈永正:《诗注要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49-358页。李晓黎:《宋诗宋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71-280页。周金标:《中国古代诗歌注释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第57-70页。